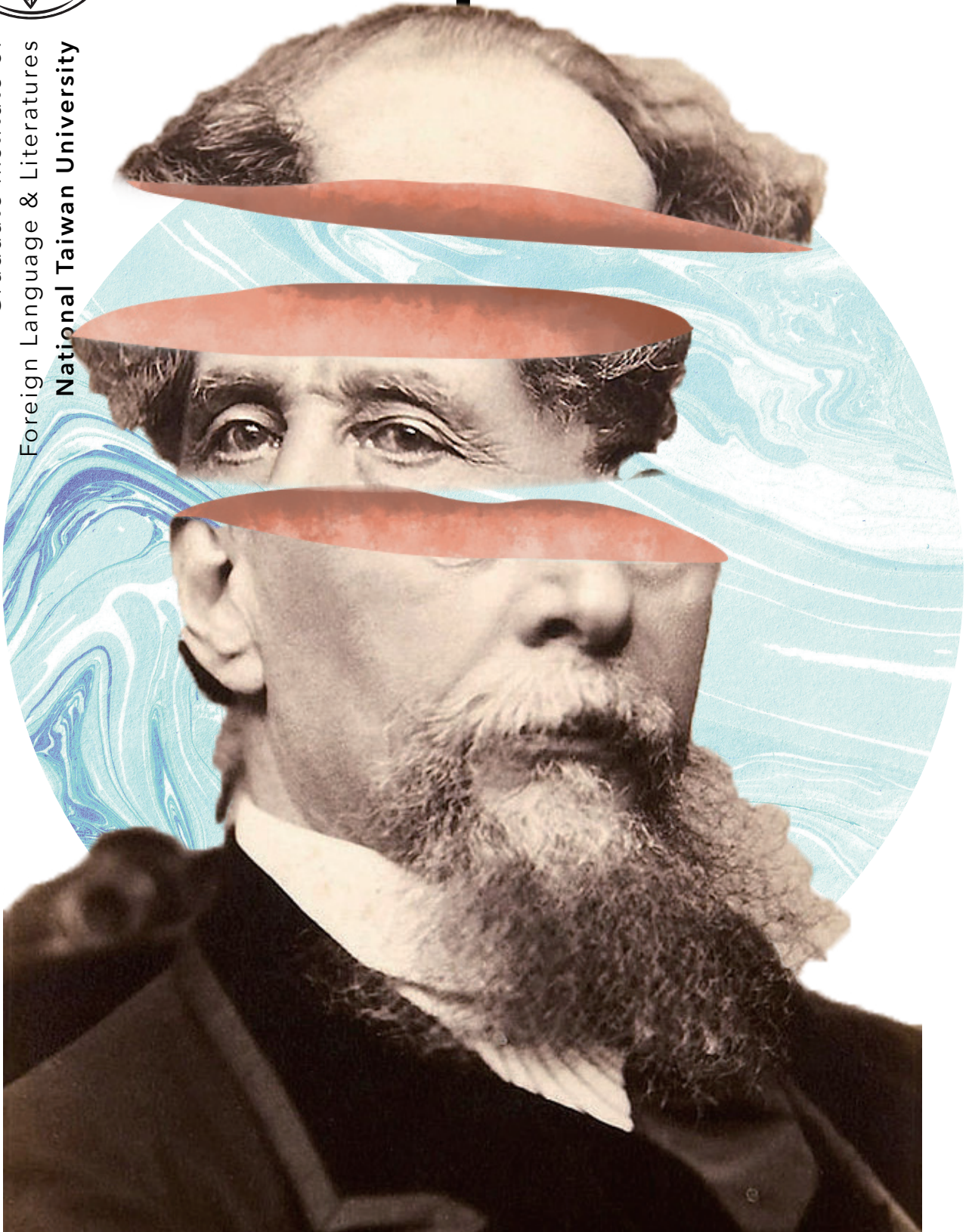




Graduate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 & Literatur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oject+

Issue No.9
March 10 2018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研究所第九期電子報

發行人 李欣穎所長 責任顧問 吳雅鳳教授/柏逸嘉教授 (Prof. Guy Beauregard)

責任編輯 陶俊成/沈聿宣 美術設計 沈聿柔



CONTENTS



Project+

臺大外文所電子報由學生自發編輯，為臺大外文所出版之官方電子刊物，於每年三、六、十、十二月十日發行，內容包含本所的活動報導、專題報導、書評分享，以及英美文學界的最新消息與發展。

誠摯地邀請對臺大外文所與英美文學界的最新動態有興趣者，一同閱讀臺大外文所電子報！

02 編輯報告：
朝向誰的寫作？

03 關於研究所規劃和反思：
專訪陳定良學長

12 「批判的親密性」：
高俊宏《橫斷記》與太平洋生態史

16 天才與庸俗：
劇場的尖銳提問《源泉》

18 Necrophilia in Faulkner's "A Rose for Emily"

23 2018 年 3、4 月外文所演講資訊

編輯報告：朝向誰的寫作？

老實說，書寫的過程中我仍不知道這份刊物為何而作，為誰而作。

回頭翻找 2016 年的創刊詞，濃密的外文所史與改革計畫，甚或是熱切的傳承使命，對一個兩年之後非本校非本系的所刊編輯來說竟如此陌生。說穿了，也許是「台大外文」這幾個字蘊含的圈內性對我還沒產生意義吧。撇開這層自我矛盾，刊物的對象性也讓我不知從何著手。如果同是所上師生，需要憑藉這種形式交流的意義為何？又或者，一到兩篇的訪談稿搭配幾篇學術短文，對於研究興趣疏異的研究生們而言，這樣一份刊物的可讀性又在何處？如果也有本校大學部，或者外校的讀者，這些圈內性對他們的意義又何在？一期一期做下來，到我們手上也已經進入第九期，而我們到底對這份刊物的想像何在？我們好像沒有正面迎接過這個問題。

然而，在後現代的社會裡，尋找恆常意義註定是幻夢一場。它們只會不斷滑脫，不斷消逝，最終徒留我們在這片荒原無盡地呼喊；但這也不代表我們應該放棄嘗試，只不過路徑會有所不同：從被想像出的群體性走向實際的個體，從拳拳到肉的切身感受，邁向讀者與作者（編者）共築意義的階段。編者的主體性無法被抹滅，既有的偏見與慣習再怎麼修飾都可能無意流露，而所有試圖感同身受的嘗試，終究只會是嘗試。因此，我們只能丟出一些指示物（甚至不能是路標），邀請每個個體主動去銜接這之間的距離。而所有未盡的面向，我（甚至不能替我的編輯夥伴代言）必須很遺憾地承認，那就是我的侷限，留待後來者填補。

這麼說來，這期的刊物應該是極度自私的吧：在定良學長的訪談裡，是我和聿宣對於各自狀況的提問，不論是實際的研究生活規劃、入手新議題的方式，或者理論與社會間的關係，向內向外都是由我們的關懷或焦慮出發，而如上所述，這是我們唯一能做到的。

感謝聿宣在再三拜託後願意協助編輯，和我思考這些困難的問題，並且提供排版美編的協助。同時，感謝聿宣的妹妹聿柔替我們設計封面，希望這篇短文可以勉強不讓封面的前衛遜色。最後，感謝每個善心的投稿人，以及系辦屢受我打擾的 Cindy 助教，非集眾人之力，這份自私的刊物沒有可能。

陶俊成
2018.02.27

關於研究所規劃和反思：專訪陳定良學長

採訪者：陶俊成、沈聿宣

學術起步

—「我們和自己讀的那些文獻，以及自己的研究題目之間，這三者的關係應該是親密的。」

Q：學長在大學時期不是英文本科系，對嗎？

A：對，我在政大原本是主修經濟學。

Q：想請問從經濟系雙主修到英文系，並且在研究所繼續攻讀外文，這樣的跨領域背景對你學習上的影響或收穫是什麼呢？

A：其實我是大四才雙主修英文系的，積極修英文系的課程大概是大四、大五兩年。當初會想雙主修，一方面是因為以前就想進英文系讀書，另一方面也想拓展經濟系以外的視野，因為經濟系的課太量化了。那時候唯一有興趣的課大概只有經濟思想史。這門課對後來英文系的學習稍微有幫助，因為老師會帶我們思考新自由主義、新殖民與經濟政策之間的關係。這的確讓我在文學研究讀到相關的議題時，有更實際的理解。

當前經濟系受美國計量經濟學的影響很大，所以路線非常量化。當初我也考慮過讀經濟所或是財金所，但大部分的課程跟研究都是量化研究，比較強調建構數理模型以及分析經濟數據。這樣的研究路線到最後讓我覺得很疲乏，因為當我們把人的複雜性化約為數據跟參數，事實上無法解釋很多事情。比方來說，在計算 GDP 時，我們通常假定每個人生存情境可以用若干變數來計算，但其實還有更多更複雜的東西，而那些無法被反映在數據面向的東西，或許才是使人之所以為人的原因。

我的意思當然不是說量化完全無效，它還是有一定的解釋力。如果簡單把研究方法區分為質化與量化，有時還是需要質化的東西來幫助解釋量化的模型，但這種訓練在經濟系的學習過程是相當少的。舉例來說，回到我剛剛提到的經濟思想史課程。經濟思想史是大三的課，但很多關於經濟學與經濟系建置的反身性思考，卻是在這門課才開始討論。

Q：是否會覺得自己原本不是本科系，然後轉而念外文所會落後別人很多？畢竟比起本系生，自己比較沒有那些先備知識。

A：以前如果沒有上過理論課的話，一定會有這種所謂落後的感覺。我剛開始修英文系的課也有這種感覺。譬如我一開始修劉建基跟胡錦媛老師的文學課程，還有伍軒宏老師的理論課程，基本上都跟不上進度。但這不見得是件壞事，重點是你要怎麼去處理它。也就是當你知道自己可能因為跟不上別人而感到焦慮的時候，你能不能想出一些處理的辦法。一個

很實際的辦法就是直接去修理論的課程，讓自己比較快進入狀況。或是自己也可以找書來看。既然你知道自己想學，但還沒有開始，那就趕快開始努力學習。

另外，在研究所階段比較需要發表自己的意見，可能也是另一個壓力來源。不過，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其實跟你浸淫其中的時間不見得直接相關，而是自己對於討論議題是否足夠敏銳。研究所課程理論上就是能幫助我們培養敏銳度的訓練過程，這並不只包括寫期末報告，其實也包括每週的閱讀經驗。在閱讀文本時，我們可以嘗試問自己問題，譬如是否同意作者的論點？文本和自己研究興趣的關係？雖然我們在這個累積過程可能會不斷遇到無法解決的問題。這也不是壞事，因為我們不就剛好可以透過寫期末報告來處理這個問題嗎？拉長時間來看，在寫期末報告前幾周才突然憑空想出一個問題的狀況比較不實際一點。我們其實整個學期可以從很多小地方開始練習，而這些訓練的確會讓我們變得更敏銳。

我以前在政大修紀大偉老師的課程，他就很要求大家發言。他問的都是根本的問題，譬如你是否贊同這個作者？你覺得這本書哪裡寫的好？哪裡寫的不好？其實我事後想起來發現這是個蠻有用的訓練過程。朱偉誠老師的訓練更重視平時閱讀的累積與自身研究之間的關聯。當我跟他 meeting 的時候，他通常第一個問題就是問你讀到哪些有趣的點？這當然不是要我們在短時間摘錄一本書全部的內容，因為那不大可能，而且我們也不可能對那本書所有的內容都感興趣。偉誠老師接下來問的問題一定是：那你覺得這對你的研究有幫助嗎？有的話，可以怎麼討論？沒有的話，要怎麼處理？這說起來是一個很簡單的過程，

其實就是看自己是否平常願意花時間，練習去思考這些問題。這話說回來，就是你的研究關懷，只是說現在做這種反身性的思考需要別人提醒你。我們和自己讀的那些文獻，以及自己的研究題目之間，这三者的關係應該是親密的。

因為自己比較注意同志研究的關係，有時候我會覺得手邊讀的東西跟同志似乎沒有什麼關係，或是其實有關係但我還沒有發現？這種還沒有被解決的問題其實就很值得去思考或是去發展成為一個問題意識。這個其實也是女性主義或是同志研究的基本態度，譬如說女性主義學者強調為什麼所有的文學史都是男性的文學史。同志文學研究也很類似，他們疑惑為什麼所有的文學都只側重異性戀關係，即便講情感或情侶關係也都是以異性戀模式為主。這些學者們其實也是從這些小地方開始，進而發展出自己的一套論述。

Q：所以當初念文學，其實也是想要和實際生活有接觸，或是想去補足量化的缺點嗎？

A：高中時其實就是想念英文系，不過最後陰錯陽差，考到經濟系去。當初就一直想雙主修，但因為政大英文系的雙主修標準蠻嚴格的，所以一直失敗。後來覺得就算雙不到，也想試著去修課，就硬著

頭皮去上剛剛提過那幾位老師的課，而他們也都影響我很深。在他們的課程裡，你可以看到文學研究如何給你重新認識這個世界的可能性，即便這個東西無法立刻反映在社會上。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伍軒宏老師在課堂上說：「大家在讀過這些東西之後，要在社會上找到自己的戰鬥位置。」不見得我們讀了什麼科系，戰鬥位置就被固定在某個地方，而是要思考如何運用所學來參與或介入這個社會。在找到想做的事情之後，盡可能去發揮自己的影響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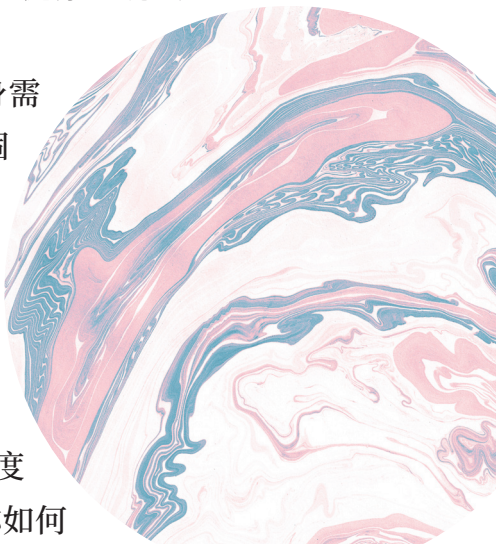
理論與社會

—「社會改變往往是理論研究的討論對象，而理論研究本身也身處在社會改變的過程裡頭。」

Q：這樣的話，感覺就是在討論理論研究如何產生實際的社會改變了。從你的說法看來，所謂「改變」並不是具體的政策方面，而是人們如何思考事情？

A：其實我認為「理論研究如何產生實際社會改變」這個題目本身需要被拆解。我的意思是，這樣看來好像理論研究跟社會改變是兩個獨立的個體，好像是要用理論研究來改變社會。但實際的情況應該是更動態而複雜的。社會改變往往是理論研究的討論對象，而理論研究本身也身處在社會改變的過程裡頭。更複雜來說，很多理論家其實本身就參與社會改變的過程，像是法農、德希達，或是巴特勒，他們每個人都可以說是相當積極的社會參與者，所以這兩個東西其實不是完全分開的。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參與的角度就可以變的很多元。除了書評或教學之外，譬如你要從事出版，你如何把外文所學到的東西或理論的思考方式帶進出版？翻譯小說大部分都還是歐美小說，你如何從外文所的批判思考試圖去打開大家對所謂世界文學的想像？最近不是很多人在做東南亞文學？你如何很實際地去思考你的所學其實是某種社會改變，然後接下來看你能做出多少事情。

也不見得說理論思考一定要立刻造就社會改變，有時你可以說理論改變本身就是社會改變的過程，這是一種後設或理論層面的思考。譬如說酷兒研究經常使用一些所謂「不太實際」的理論，例如布朗蕭，可是這種理論資源就變成酷兒理論重新想像過去現在和未來這些時間觀的重要理論。應該是說，目前的提問方式很像是每個東西都是獨立的存在，可是其實他們都是在一個更複雜的網絡裡頭，所以重點是你如何去串聯不同的理論資源來做事情。即便你做所謂的純理論研究，它還是出於一種對於人類生存處境的關懷。從一個更關係網絡的角度來思考參與社會這件事，他們一定有彼此可以引用、彼此串聯或參照的座標。



Q：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文學有沒有用」這種問題其實不是個妥善的提問，對嗎？

A：因為它並不是有用或沒用的問題，而是你到底是怎麼參與其中，或是你怎麼用文學來參與社會的問題。文學本身就是社會的一部份，不然你沒有辦法解釋為什麼人還是需要讀故事，為什麼我們還是需要一些 narrative 來訴說我們的生活或是來認識這個世界。你可以很本質地說這就是人生的一部份，但你也可以說這是很根本的，我們認識世界的方式，只是現在問題是它在某些意識形態的運作下被忽略或刻意地被遮蔽起來，或是它被包裝成、變形成某一種東西，而我們現在在外文所怎麼用我們所學的東西來重新形塑這件事情。它也不是聽起來這麼形而上的東西，例如秘密讀者、聯合文學和幼獅文藝，他們其實最近都在做很多改變，所以它並不是一個有沒有用的問題，而是我們提出不同的思考方式，如何成為想像不同可能性的基礎。

Q：所以問題應該不是「文學是否有用」而是「如何用」？

A：我不太喜歡「用」這個字。「用」有一種工具感，我不太喜歡這種講法。它比較像是一種你怎麼從文學的角度出發來參與社會。

Q：關於參與這點，可以請你多說一些嗎？

A：我自己也還在學習的階段。不過，就我的觀察，我不少從事教育的朋友都在思考文學要如何融入教學，或甚至是文學理論要如何帶進中小學生的生活中。再更實際一點，或許寫書評是一個大家都能做的事情，試著把我們在研究所或是大學裏頭學到的專業知識，轉換成跟社會溝通的媒介，希望能產生一些改變，或是讓台灣社會多一點不同的聲音。

研生活紀實—期程規劃與理論研究進路

—「不要把它當成一個很神聖的東西來對待，我覺得把理論除魅化這件事情是一個很實際的心態。」

Q：想請問學長如何規劃自己研究所的兩年生涯？

A：一般都會覺得修完課再寫畢業論文，但我覺得可以換一個方式。畢竟碩士班最主要的畢業條件就是寫一本碩士論文。釐清這個目標，可能會改變修課的方式。雖然我們不見得一定只修跟自己研究有關的課，但是我在修其他領域的課的時候，我也可以有一個參照點，也就是說我修了這個東西，我每個禮拜讀的東西到底可以對我的研究或者是我的研究興趣、

研究成果有什麼樣的幫助；就算沒有幫助也沒關係，至少你可以知道為什麼沒有幫助，這也是個滿重要的點。如果可以從這個心態上改變的話，或許會變得比較積極一點，像剛剛說的，你可以不斷問自己每個禮拜讀的東西到底好在哪？不好在哪？跟自己有什麼關係等等。透過這樣的詰問就會變得比較不是在單純修課或學東西那種被動的感覺，就算比較沒有幫助，也可以想看看它為什麼如此，這其實滿有趣的。

我剛剛說的可能就是兩個軌道吧。一個就是你的修課，一個就是你碩論的規劃。其實我自己的碩論花最多時間的是文獻回顧。所以建議早一點訓練自己熟用資料庫，還有如何查文獻。譬如說你對生態有興趣，就可以去資料庫查看看，觀察大家如何做生態研究。這是一個很直接跟實際的方法。

Q: 所以感覺不是一個 bottom-up, 而是一個 top-down 的概念, 不是我去理解說什麼是生態理論或是有哪些人哪些東西要讀, 然後再去找研究來看這樣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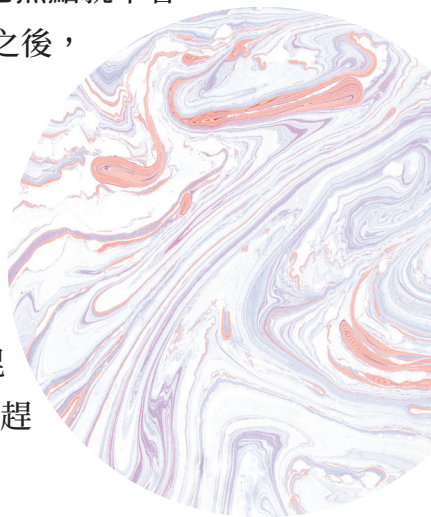
A: 或許說, 可以從綜覽全局的角度著手, 因為地毯式的研究策略會耗費大量的時間跟心力。雖然當你確定研究方向之後確實是要地毯式的閱讀重要著作, 但一開始可以從一些初步的概念出發。

Q: 因為我們常常都在做 bottom-up, 覺得沒有好好了解一個理論的大框架就會覺得很焦慮, 常認為需要讀熟某個理論的發展和介紹才能夠開始, 想請問學長在這方面的意見?

A: 一般我們可能會直接去找一本入門書, 然後入門書就會跟你說酷兒理論就是從誰開始、是誰發揚光大等等, 然後進一步去找那些書來讀。但我後來覺得入門書不太有幫助。應該說它有一定的幫助, 比如說你讀了那幾頁之後, 你可以大略知道酷兒理論大概是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開始, 發展到後面有怎麼樣子的改變。但是入門書畢竟是大幅度簡化的, 受限於某些特定的觀點或是書寫目的。因此, 與其從單個學者開始, 我覺得可以從一些概念著手。假設你對 performance 和 performativity 有興趣, 就可以從這邊開始去找一些東西來讀。雖然有些人會覺得這個概念很舊, 可是這個問題可能並沒有妥當地被解決, 它可能還是一直困擾著酷兒理論的一個問題, 這樣它就會變得像是一個問題意識。假如我們從這個問題意識出發去讀東西, 一方面可以比較宏觀地讀到這個概念怎麼樣被使用以及後面學者怎麼樣修正它, 然後另一方面也可以訓練自己去評價的方式, 因為它焦點就不會那麼巨大。而是你從一些概念著手, 大致掌握酷兒理論的一些發展面向之後, 深入了解整體其實還是需要的, 回過頭去仔細地讀一些重要的書籍。

Q: 所以也不是說完全否定掉 bottom-up 的概念, 它會提供一些刺點, 再從那些刺點出發去尋找專書或論文, 然後再回頭過去檢驗自己是不是真的對這個題目有興趣, 再去形塑自己的問題意識嗎?

A: 它可能也不是像這樣清楚地切成一個一個的階段, 因為它其實是混雜在一起的。只是我覺得入門書或許趕快讀一讀就可以, 這個階段可以趕



快過去。背景知識還是不能忽視，但直接而實際地去處理研究問題，或許對我們的幫助比較大。既然念到研究所了，我想我們都有能力去讀專書，只是說讀專書的時候不要壓力太大，覺得它是一個很玄的理論，就像我剛剛說的，你可以從一些小的地方開始自己問自己、自己跟自己討論看看，或者就跟朋友討論看看書上講的到底有沒有道理。不要把它當成一個很神聖的東西來對待，我覺得把理論除魅化這件事情是一個很實際的心態。譬如酷兒理論，它就是在處理一個很實際的，所謂酷兒主體面對到的一些問題，其實你是可以從一些很實際的角度來進行檢驗的。

研究生活紀實－研究焦慮與學術社群

—「讓自己一直保持在動態或對話的過程中，比較不會覺得自己很孤單。」

Q：這裡想回頭問問學長，記得你曾經提過自己在大學時沒有修過酷兒理論的專門課程。當初是如何開始做基礎研究，然後慢慢到現在碩論以此進行開展？

A：其實主要還是受伍軒宏老師在政大開的「文學理論與文化批評：從柏拉圖到酷兒」課程影響很大。這門課雖然沒有花很多時間談酷兒研究，但老師還是很盡責地講了傅柯、巴特勒等人的問題意識。那時候讀到莫名有種很想繼續多讀的感覺，也許是和自己的生命經驗相關。這可能就是做所謂意識形態批評時，要去批判某個東西或文化，往往從自己的經驗出發會比較能夠有所關懷的起點。當然也不是說所有的同志都要做同志研究，應該是說如果你做的東西可以回應自己的生命經驗或是關懷的問題，會比較好的一個方向。雖然這樣講好像很八股，但你也才可以比較持續的做下去。除此之外，我在大學在陳音頤老師的指導下進行過大專生計畫的研究。我那時候決定做酷兒相關的題目，特別是能跟亞洲有所關聯的部分，所以最後決定討論亞美酷兒離散，以及其中跨國勞動的問題。我碩論的主題也是這個問題意識的延伸發展。

Q：不過在撰寫大專生研究計畫，或者自己摸索酷兒理論的過程中，會不會遭遇倦怠期呢？如果有，又是怎麼克服的？

A：我自己較實際的感受比較像是焦慮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我覺得倦怠比較像是個狀況，是你沒辦法繼續做你應該做的事。這有時候不見得是壞事，因為它可能是個徵候。這時可能就需要停下來想想自己的狀況。更多時候是你不了解自己現在的處境如何。你可能讀了很多書，但你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沒有讀進去，或者你不知道讀這些書要做什么。這種情況其實可以回到一些讀書的方法。我覺得在研究所讀書跟大學不太一樣，同樣是為了汲取知識，但你可以更有批判性的做這件事。你可能要訓練自己能不能評價一本書的好壞。但這其實不難，你可以讓自己處在一個有在運作的狀態：在你讀完一本書或一

些章節之後，你可以問問自己說，這部分你同不同意這個作者？你同意或不同意哪個部分？你覺得有什麼東西是跟你研究有相關的？試著提這些問題，可以讓自己更知道自己的位置。讀懂多少？哪些東西是可以拿來用或參照的？可以讓自己處在一個學習的動態過程裡，而不是單向的接收那些龐大的知識。從一些小部分開始訓練自己能與這些知識對話，這是我覺得可以讓自己處在持續運動的狀態，而不是很膠著或很焦慮的嘗試全部讀懂，之後你就比較可以建立自己的價值判斷，而這也是最終的目標。

至於焦慮的部分，我覺得還是找朋友討論。不見得是要跟自己研究那麼相關的朋友，因為說老實話，你的研究最終是要拿出去跟別人討論的，而對方不見得是跟你同領域的。因為彼此可能都是門外漢，他可能會提出一些你沒想過的問題。而且其實，在對話的過程中，你本身也在進行整理自己思緒的工作。我自己的經驗是，常常聊完之後，你其實更知道自己在幹嘛，像我碩論的第一章就是一直跟冠維聊天才有辦法生出來的。這其實就很有趣，因為說的過程其實就是在整理自己，更好的方式就是你就直接寫。大家好像會很焦慮怕寫不出東西，可是你可以嘗試把剛剛那些小問題試著稍微寫成小篇幅的東西，讓自己處在跟人對話的狀態，會比較不那麼焦慮。這其實也是我後來試著在 Medium 上寫短文的原因。有時候我發現我讀到一個段落讀不下去的時候，我就會覺得要寫出來，一方面是記錄自己到底讀了哪些東西，可能有些蠻有趣的想法；但另一方面就是在練習寫作。畢竟學術寫作不是一個那麼特殊的情境，不是寫報告才是學術寫作。讓自己一直保持在動態或對話的過程中，比較不會覺得自己很孤單。

Q：除此之外，想請問學長如何培養或探索自己的學術社群？

A：參加研究生會議是一個方法，但我覺得現在這個時候可能可以多做一些，因為臉書實在太發達了，上面其實有各式各樣的學術社團，例如有世界文學社，而且它有些社團真的很特定，像是亞洲酷兒研究社或太平洋酷兒研究社，裡面會有各式各樣的人，有學者、正在求職的博士生、要準備申請博士班的學生或社會運動者等等，所以其實你從這些社團裡面都可以學到滿多東西的。而且有些社團因為比較國際化，而且因為是學術性，所以它有時候是一個策略性的東西，像是你如果要組 panel 到國際會議的話，你的成員組成越多元越好，很多人就會在社團上面直接找人。因為上面的人會比較積極，加入了那個社團照理來說也會比較積極一點，例如他們會分享很多 call for paper，或是問你最近有什麼新的課程，甚至會有剛畢業的博士生要教書，就會在上面問說：「我要教某某課程，想要討論某個主題，有沒有人可以推薦一些書或是論文？」然後下面就會有很多人回應，其實還蠻有趣的。

研討會與學界動態

—「發表不管對學術生涯或者自己的寫作來說都不是終點。」

Q：學長上學期好像參加了三場研討會發表，想請你談談發表的經驗，或者和其他與會者的互動過程。

A：以前會很幼稚的覺得學了一個理論就拿來分析文本，好像自己有在做些事情，但後來會漸漸覺得說，好像應該真的有話想說再去發表。所以說我現在會覺得發表比較像是中間的過程，因為其實發表不管對學術生涯或者自己的寫作來說都不是終點。不是說發表完之後就沒事，就走了，到最後還是要寫出一篇期刊論文或一本書。我現在自己覺得應該把視野拉長一點，可能要理解到研討會的發表只是個過程，而且它不見得是個那麼光鮮亮麗的事情，可能去講的時候都沒有人理你，或者因為你可能講得是太過個人的專業，所以無法引起共鳴。這當然是需要練習的，但就是說發表可以让你練習，譬如口頭發表或應答技巧等等，但他比較不是一個終點。我以前都會覺得發表越多越好，但現在就不會想這麼常發表。總得把以前跟別人談過的東西寫出來，不管是在學院內或學院外。那樣會是一個更有價值的東西吧。

Q：想請問學長，發表的契機是有計畫性的去投稿，還是看到徵稿就去投，上了再去準備？

A：如果目的是練習的話，當然就是你寫了報告之後有什麼適合的就去投。如果說你已經很清楚自己的研究興趣，你當然是可以做比較長期的規劃，關注一些研討會然後去投。同時，你的學期報告也可以轉換一下心態，因為它可能是可以轉換成期刊論文的。你寫的報告一方面要求高所以品質好，另一方面它就可以拿去研討會上檢驗。如果獲得意見，就可以修改過後去投稿。

Q：因為自己參加研討會的經驗有限，想知道回饋對你的實際助益為何？

A：在去年參加的三場研討會裡，其中兩場都有評論人。師大的評論人沒有問太嚴格的問題。我當時對師大那場的想像是，每個場次的主題都很聚焦，而且又把同樣專業的人放在一起，我以為對方應該也會想積極討論，所以導致我的提問準備的太多，比較之下有點懸殊，所以場面有點尷尬。政大台文的那一場評論人相當認真，不曉得是不是有事先要求，兩天的場次評論人都卯起來問問題。不過可惜的是，在對方提問完，而我回應後，就沒有時間再接下去談。

Q：另外，常常在研究室聽到學長談論台灣酷兒理論的狀況，想請問你如何去追蹤或更新台灣酷兒理論，或者台灣學者的研究現況或消息？

A：因為台灣的學術圈說實在也不大，做酷兒的老師並不多，上網查一下就找得到。至於現況，國內外的期刊資料庫其實最方便，可以時不時就去找找看，看看最近同志研究、酷兒

研究有沒有新的文章。

直接去修相關課程也很有幫助。不少老師會在課堂談他對某個研究領域的現況，我們就有機會聽到更多東西。我過去修過紀大偉老師的同志研究、朱偉誠老師的性相研究、鄭芳婷老師的台灣酷兒戲劇等等，然後也去師大旁聽過曾秀萍老師的同志文學課程。你直接去上那些課，照理來說會對於現況的把握更了解；但如果說很不巧你的研究領域沒有什麼老師在開課的話，那你也不一定要只關注台灣，也可以看一看國外的期刊，看有沒有什麼新的發展。我覺得研究生可能不見得說要對於這個領域完全熟悉，但至少被問到這個領域的發展輪廓，應該要是可以講上幾句的。



(左起：沈聿宣、陶俊成、陳定良)

「批判的親密性」：高俊宏《橫斷記》與太平洋生態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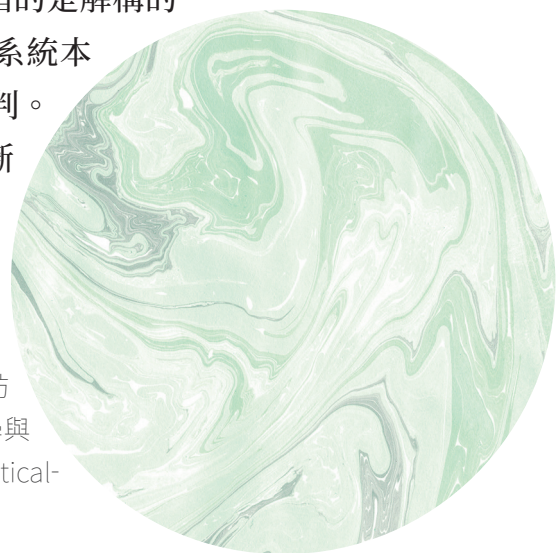
陳定良
臺大外文所碩士班二年級

因應台大博物館群在去年（2017）已啟用到了第十年的歷史時刻，台大博物館群在台大校史館推出十週年特展「南·洋：臺大博物館群東南亞與大洋洲『點』藏」。根據台大博物館群官方網站的介紹，選定東南亞與大洋洲作為本次特展的主題不僅是因為「此區地緣位置與臺灣最為接近」，也是由於此區的展品是台灣主題以外為數最多的收藏。¹ 參展觀眾走進校史館二樓，便會看到展區一側大幅的展覽介紹，簡要定位了特展的知識脈絡並且試圖呈現台灣與太平洋島嶼的關係網絡：「大航海時代的探險家在這些島上補給並留下大名；太平洋戰爭期間這些島嶼被激烈地爭奪著；但也別忘了早幾千年這些島嶼是南島民族遷移擴散的舞台，後來也定居至今」。這樣的介紹有兩個值得留意的問題。第一，大航海時代與太平洋戰爭的主體消逝無蹤（無論我們說的主體是發動戰爭的帝國，或是戰爭時空的受難者）。第二，即便暫且擱置特展介紹提及的帝國擴張與戰爭脈絡不論，我們依舊不難發現這些歷史問題幾乎從整個特展的呈現被抹去痕跡。換句話說，特展原先用以證實台灣與「南洋」之間關係網絡的論點，不僅被提前取消，甚至成為特展之外的歷史陰影。進一步後設地來說，台大「博物館群」這個展示空間本身的殖民建置歷史，也未被提到前景，成為反身性思考的起點。諷刺的是，這些歷史的空白、縫隙、缺席，卻是使得這個展覽本身之所以可能的時空基礎。

相較於前述的「南·洋」博物館群展覽，高俊宏在去年出版的《橫斷記：臺灣山林戰爭、帝國與影像》提供了一個截然不同的詮釋角度。高俊宏用自己的身體進入殖民歷史的現場，挖掘掩藏在台灣集體潛意識底下的歷史物件，企圖以台灣生態作為立足點，重構主流的戰爭敘事與帝國記憶。高俊宏以身體介入歷史的努力，或許可以視為史碧娃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所謂「批判的親密性」（critical intimacy）。² 「批判的親密性」一詞出現在史碧娃克批判西方女性主義與英國帝國主義意識形態共謀關係的著作《後殖民理性批判：邁向消逝當下的歷史》（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批判的親密性」指的是解構的思想工程：從一個系統的內部來批判、拆解並且翻轉二元的系統本身。也就是說，解構不是來自外在的挑戰，而是生於內在的批判。不同於史碧娃克奠基在文學閱讀的解構策略，高俊宏在《橫斷

1 有趣的是，台灣分明身處此特展關注的地區之中，為何特展介紹僅僅指出台灣與此區的地理位置最接近？

2 史畢娃克在近年的訪談也曾經提過「批判的親密性」。例如，2016 年，史畢娃克在《洛杉磯書評》（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因應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書寫學》（Of Grammatology）出版四十週年的修訂譯本所進行的訪談中，便以「批判的親密性」來重探解構哲學的意義，以及她同時在印度小學與哥倫比亞大學教書的生命經驗。見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critical-intimacy-interview-gayatri-chakravorty-spiv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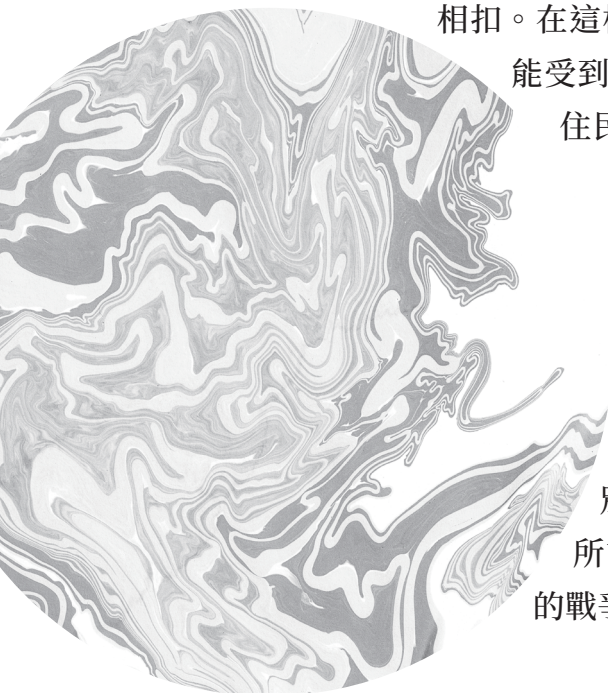
記》事實上是用身體勞動呈現了「批判的親密性」，透過不斷重返殖民現場、不斷重新書寫紀錄、不斷重讀檔案文獻，讓讀者進行不可能的倫理見證。《橫斷記》的書寫由四個看似相異的歷史現場所串聯而成，包括泰雅族原先在三峽大豹溪居住的「大豹社」；泰雅族在宜蘭舊太平山區域的傳統獵場「眠腦」；十九世紀末日本軍隊攻台的重要據點之一「龜崙嶺」（位於現新北市樹林區）；承受韓戰與美援影響的台中縣「大雪山」茶場。雖然高俊宏針對這四個地理位置的書寫，大致都從空間的描述著手；但是，《橫斷記》再現空間的方式，卻一再讓我們體會到難以被大敘事收納的諸多特殊時間性，如何幽微地閃現於個人在歷史結構變遷下的微小經驗，例如，泰雅族口傳文學乘載的歷史記憶、王阿貴給白色恐怖時期藏匿龜崙嶺山區的兄長王清送飯的地圖。

高俊宏的《橫斷記》不只反思台灣集體潛意識所否認的諸多歷史事件，更將台灣生態歷史放回到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之間，太平洋區域的帝國競逐脈絡。換句話說，《橫斷記》呈現的台灣生態歷史並不是單獨存在的歷史情境，而是屬於太平洋生態歷史的一部份。

《橫斷記》探討的三峽茶場正是一個能夠體現如此問題意識的歷史時空。在全球資本主義發展愈趨消弭國家疆界的當代時空，低廉勞動力無疑是資本家為了發展事業而不斷追逐的生產要素之一。為了奪取低廉的勞動力投注在生產過程之中，資本家在不同地區快速的進行資金挹注與抽離，不只造成經濟結構的改變，更直接或間接對在地生態地景產生影響。就茶葉經濟的變化而言，高俊宏指出，「台灣茶基本上只能往相對高價與精緻的茶文化路線發展」（55）。然而，以大寮茶場為例，結合旅遊觀光、茶葉經濟與文創產業的大寮茶文化館所陳列的「文史資料」，「只述及三井合名會社，卻遮掩了大豹社如何在此抵抗日人，甚至奪下七十釐米山砲並已之反擊的史實」（57）。當然，與其說高俊宏在此希望我們反射性地開始批判精緻茶葉經濟與文創產業，毋寧說《橫斷記》裡諸多歷史的個案研究，整體而言指向了這個島嶼的集體記憶困境。高俊宏在《橫斷記》不只透過自己的文字與影像紀錄，也藉由官方的論述與檔案呈現，讓我們看見台灣生態的剝削過程，事實上與跨國商業競爭、日本帝國主義、美國軍事主義、視覺化的殖民科技、資本主義的積累過程環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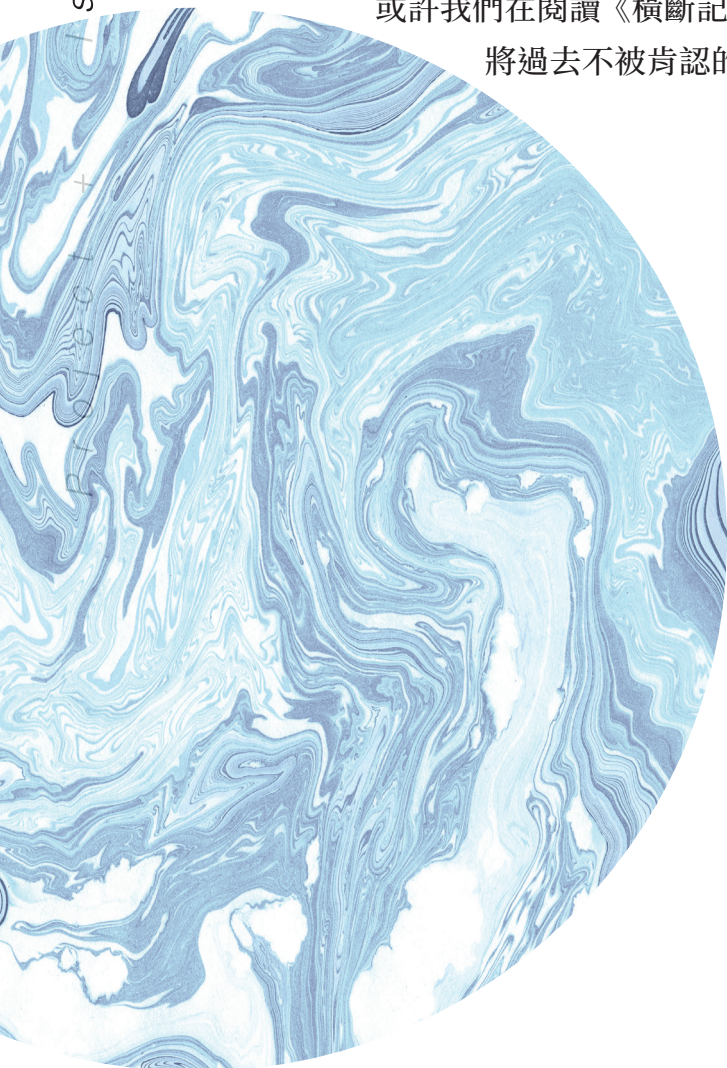
相扣。在這樣相互交雜的剝削過程中，台灣原住民的生存情境終究未能受到應有的重視與肯認。高俊宏的《橫斷記》讓我們理解以原住民的視角，重新閱讀台灣生態史以及帝國殖民史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高俊宏除了以文字來脈絡化歷史事件，也以照片檔案來讓讀者見證歷史。《橫斷記》的副標題並置了「戰爭」、「帝國」、「影像」，不禁讓人聯想到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晚期著作《戰爭之框》（Frames of War）。巴特勒認為，逝者的哀悼受限於主流社會有差別的分配（differential distribution），而這樣的差別分配事實上受到我們如何理解戰爭所影響——也就是她所謂的「戰爭之框」。顯而易見的例子是，美軍在中東發動的戰爭所逝去的士兵，是美國社會所積極哀悼的對象。至於在中



東無辜死去的平民百姓，可能是無法被哀悼的無名生命。回到台灣的歷史情境，在（主要是）日本帝國所發動的山林戰爭所死去的原住民生命，可能正是無法，或未能被台灣記憶妥善哀悼的逝者。儘管如此，透過高俊宏在《橫斷記》提供的無數影像紀錄，我們或許能夠在已被框限（framed）的帝國殖民歷史中，透過不同的思考途徑（例如，生態、原住民）來拆解記憶框架（un-frame），進而重新框架（re-frame）台灣歷史的詮釋可能。巴特勒這本書的副標題是：「何時生命才是可以被哀悼的？」（When Is Life Grievable?）。

或許我們在閱讀《橫斷記》的過程中，能夠不斷重新開啟這樣的倫理時刻，將過去不被肯認的幽靈，重新放回我們對台灣的記憶之中。



參考文獻

高俊宏。《橫斷記：臺灣山林戰爭、帝國與影像》。台北：遠足文化。

Butler, Judith. *Frames of War: When Is Life Grievable?* London: Verso, 2009. Print.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Critical Intimacy: An Interview with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LA Review of Books*. 29 July 2016. Web. 25 February 2018.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Cambridge: Harvard UP, 1999. Print.

天才與庸俗：劇場的尖銳提問《源泉》

洪姿宇

臺大外文所碩士班一年級

《源泉》改編自艾茵·蘭德 (Ayn Rand) 的同名小說，比利時導演伊沃·凡·霍夫 (Ivo van Hove) 與荷蘭阿姆斯特丹劇團合作，演出一部尖銳、讓人坐立難安，隱隱生痛，但極其動人的戲。

有些藝術作品無法以任何評論為詮釋，唯有另一件作品才能與它進行對話、在藝術形式中產生幽微的共鳴通道。回應藝術品最好的方式是拿出另一件藝術品、回應一部小說最好的方式是寫另一本小說。對我來說《源泉》就是這樣的作品，它直白、複雜、龐大，或許唯有另一部劇場作品、文學寫作、哲學思想甚至是電影場景，能妥善為這齣戲帶來某種理解，而這裡關於這齣戲的隻字片語，或許也是種徒勞捕捉劇作精神的展演而已。

一齣傑出的戲必要能對觀眾提問、挑戰觀眾，但《源泉》的提問方法是，它讓觀眾內心產生強烈的矛盾，觀眾一方面忍不住要認同角色，但角色特質卻明明和自己的常識、認同抵觸，換句話說，《源泉》帶來的強烈衝突感不只是常識和角色價值間的衝突，更在觀眾自己的內部衝突，在那魔幻時刻，突然不能理解到底是什麼，讓我竟然和我「應該」要批判的角色產生共感——原來根本上我對自己的價值邊界到底在哪裡，仍是十分陌生的。

而《源泉》挑釁提出的挑戰是：它要為菁英、天才、先行者辯護，要痛訴愚蠢庸俗的世界，以及愚蠢庸俗的世界裡各種愚蠢庸俗的人們。

建築師霍華德·洛克在一開場，就表現出他與眾不同的建築品味和人情洞悉，他的建築語言充滿如何讓建築自己言說、削減不必要的累贅、留白等等藝術理念，他拒絕和不接受自己建築品味的老闆妥協，被開除亦在所不惜；他的設計風格被視為異端，長時間只能接一些小規模的案子，被同事嘲笑戶頭裡只剩十幾塊錢，甚至去當採石場工人，但他仍然不肯低頭。洛克是整齣戲的靈魂，是天才、孤獨的創造者，一輩子堅持自己的藝術理念，一點都不願讓步，極度鄙視低俗建築理念、追求名氣與財富的建築界風氣，以及無法領會他建築美學的愚蠢大眾。

整齣戲的高潮在於，當洛克發現他精心設計的社會住宅建案被政府單位更動設計，而自己無力挽回時，他便將興建中的大樓整個炸毀，此時舞台轟然炸響，紙張、灰塵、煙霧紛飛，藝術家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但戲透過這轟然一響要帶來的是更激進的矛盾，大眾譴責洛克「使窮人無家可歸」、「沒有社會責任、道德良知」、「恐怖份子」，甚至要將他關入監獄，聽著這些聲音，洛克只是發笑，最後一幕，他發表一場獨角演說，其實他才不在乎什麼社會住宅、窮人、集體／國家責任、所謂「為了群體的利益」，他在乎藝術創造，雖然創造者永遠是所有人痛恨的對象，但唯有創造者才能帶領整個時代往前走。

這種極菁英式的思維被大剌剌呈現，某程度上是讓人駭異的，大眾會對這樣行為作出的倫理式批評是可以想像的——道德、同理心、社會責任。但《源泉》要扣問的是，到底，能不能容許存在這種藝術、存在這種傲視大眾的天才？或者，這樣的藝術與天才是否有其必

要？為藝術而藝術這句話，在當代看來似乎早已過時已久，但洛克在舞台上這樣赤裸、直白的實踐他心中那種藝術理念，或許其中還有某種專注和純粹存在，和在舞台上四處流連、象徵普羅大眾，不斷叨念生活瑣碎，滿心掛念晚餐吃什麼幾點睡覺做人就要當個好人的長舌老婦，形成強烈對比：一邊是社會精神的失效，洛克才不在乎什麼社會互助、階級思考、自我反省，他要秀異純粹的藝術，即使這種純粹藝術可能是非倫理的；一邊是群體精神的極致，當個「好人」，但好人其實就等同平凡。

在這兩種極端之間，觀眾該如何選擇，就是最大難題，只是導演在整齣戲的前半段，那種醜化後者、普羅大眾的意向，讓觀眾不由自主地站在洛克那邊，在矛盾中為天才辯護。當然，劇場極端式的設定，讓人一方面忍不住疑惑對這種斷然劃分到底是否有效，天才真的可以完全棄絕大眾、不與他人發生倫理或情感關係嗎？所以最後劇場拋出的問題或許更是，天才與大眾之間如何能有互動關係、藝術與庸俗之間是否存在曖昧空間。或許我們遭遇的不是一與二間的選擇，而是兩者的中間位置究竟如何可能。

到了最後，導演對洛克的同情凝視其實也存在態度曖昧，這就必須提到這齣戲接近尾聲最精彩的一幕：一位企圖陷害洛克的專欄作家，以及洛克本人的獨白。舞台先是打出「劇終」字樣，此時觀眾席理所當然的響起鼓掌聲，但突然專欄作家又重新站上台，示意大家稍安勿躁，開始陳述他如何卑鄙陷害洛克的過程，在他發表完演說後，觀眾在不確定演出到底結束

了沒的情況下，突然不知該不該鼓掌，因為這簡單的舞台技巧——先打出劇終，再讓演員

上台演出——製造出了轉換效果，讓鼓掌這件事變得不單是在一場演出結束後，

戲外觀眾為「演員」的演出鼓掌，在那個時刻鼓掌，突然就帶有對角色認同的意味，

鼓掌不在戲外，鼓掌突然變成是在戲裡做出價值選擇：認同台上專欄作家的惡毒計畫。

隨後，洛克上台，觀眾在這種猶豫的情緒裡續看洛克的大膽獨白，這種表演本就若稍有拿捏不慎，就會從藝術家堅持淪落至庸俗自大狂，

但在這獨白的許多時刻，洛克的驚人之語就踩過了那條線，而這踩線或許就呈現出導演自己刻意加入的，對洛克自詡穩穩站在天才／藝術那一

邊的一絲絲不以為然，這不以為然更透過在洛克結束演說後，觀眾席間

瀰漫的到底該不該鼓掌的猶豫中展現其效果。

伊沃·凡·霍夫從頭到尾都沒有放過觀眾，觀眾不只要面對價值衝突、自己的內部矛盾，最後更被輕推一把，在電光石火的瞬間被迫做出某種快速判斷，關於藝術、自我、群體，但觀眾會記得在那瞬間自己究竟做了怎樣的選擇——鼓掌，不鼓掌，還是無所作為。這樣的問題，其實

也具現整場戲裡觀眾不斷被迫回返的自我質疑。

演出：荷蘭阿姆斯特丹劇團

時間：2017/5/27 19:00

地點：國家戲劇院

Necrophilia in Faulkner's "A Rose for Emily"

Shen Yu-hsuan

In the final scene of William Faulkner's "A Rose for Emily" (1954), "a long strand of iron-gray hair" (497) on the dented pillow implies that the protagonist has slept with a dead body for many years. The story concludes with Emily's necrophilia, and the last sentence depicting the gloomy scene astonishes readers; however, this final revelation does not just arouse readers' horror. For Brooks and Warren, Emily's necrophilia shows her pride, strong determination, and "contempt for public opinion" (Brooks and Warren 352), and those features make Emily resemble a "typical tragic hero" (Brooks and Warren 354) who "insists on meeting the world on her own terms" (Brooks and Warren 353). They regard Emily as an unconventional woman fighting against the Southerners. Similar to Brooks and Warren, Argiro thinks Emily attempts to destabilize the Southern values. In his opinion, Emily leaves Homer's body on purpose to accuse the Southerners of their oppression, and her necrophilia distracts the Southerners from her secret of "necrophilia" (Argiro 462). Like Argiro, Dilworth regards Emily's necrophilia as a distraction, but he thinks it is the narrator who tries to deflect readers' attention to the townspeople's "collusion with Emily" (Dilworth 252). Different from other critics, Dilworth does not think Emily opposes the Southerners; he believes that Emily murders her lover in order to meet her townsfolk's expectations (Dilworth 251). Brooks, Warren, and Argiro believe Emily goes against the Southern values; nevertheless, they neglect the fact that Emily does not refuse all the Southern conventions. She actually at times follows Southern values.

In order to know more about Emily's attack against and obedience to the Southerners,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social values of the South. Based on the Southern romance that all southern white women should be "prelapsarian (though well-clothed) Eve" (Dilworth 253), Dilworth thinks that the Southerners' idealization of Emily is similar to Emily's preservation of corpses, but he does not thoroughly examine the Southerners' romance that underlines not only "the myth of paradise" (Dilworth 253) but also "the legend of aristocracy" (Cash 70). If we want to underst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mily's necrophilia and Southerners' values, we need to observe both the religious and aristocratic aspects in Southerners' social values.

According to Cash's *The Mind of the South*, Southerners are depicted as "a direct product of the soil" (Cash 31), and the center of their minds was "the plantation" (Cash 32). The plantation in Southern America was so wide that people could lead lives of self-sufficiency with their family and slaves, and the plantation became "an independent social unit" (Cash 33). As planters owned properties and mastered slaves in their own plantations, they became proud of their "autonomy" and "wax[ed] continually in lordly self-certainty" (Cash 34). At the same time, Southerners' "individualism" (Cash 33) and the sense

of aristocracy were also aroused; they were confident of their social status, considered themselves as “proper gentlemen” (Cash 36), and felt superior to the blacks and to people without land. Even when new planters emerged and “the old aristocracies lost overt political and social power in the South” (Cash 61), the influence of aristocracies still lingered and even increased in Southerners’ minds. Southerners imagined the aristocracy, “yearning back toward the colorfulness and the more or less imaginary glory of the aristocratic and purely agricultural past” (Cash 64).

Emily lived in what Cash has called “an age of nostalgia” (64). Southerners missed the old time of aristocracy and wanted to return to that time. In Faulkner’s story, Emily does not try to revive the aristocracy, but she preserves the aristocratic symbol – her mansion “in the heavily lightsome style of [1870s]” (Faulkner 489). Emily’s house is the only aristocratic heritage left in Jefferson. Throughout her life, Emily lives in and is confined to the house that stands for the Southern values, and she never tries to leave. Besides, Emily does not want others to “fasten the metal numbers above her door and attach a mailbox to it” (Faulkner 496) because she attempts to preserve the heritage of aristocracy and thinks the modern process of postal delivery will destroy the essence of aristocracy.

In addition to nostalgia for aristocracy, Emily lives with the chivalric values of aristocracy. For the Southerners, they had a “noblesse oblige” to help “the powerless” and considered the obligation as “the highest product of aristocracy” (Cash 77). Besides, Southerners praised Southern women, described them as “the shield-bearing Athena gleaming whitely in the clouds”, and thought “women must be compensated” by idealizing them (Cash 89). In the text, Emily is exempt from taxes because Southerners consider her as the obligation of the whole community. Emily relies on this convention and even insists on it. She accepts the lie that she does not need to pay taxes because her father “loan[s] money to the town” (Faulkner 489). When the new mayor says that Emily has the duty to pay taxes, Emily refuses him. She lives with the help of Southerners and satisfies the old Southerners’ desire to fulfill their chivalric obligation.

Although Emily has nostalgia for the aristocracy and lives with chivalric conventions, she goes against Southern values through having romance with a Yankee. According to Cash, “the conflict of the Yankee” (Cash 62) was unavoidable for the Southerners as people in the South were so proud and patriotic toward their own society, and Southerners felt superior to the Yankee. However, while Emily is respected as the aristocratic representation, she dates a Yankee and also considers marrying a man whom Southerners despise. Emily’s affair with Homer questions the Southerners’ superiority and their conflict with the Yankee.

It seems that Emily not only follow Southern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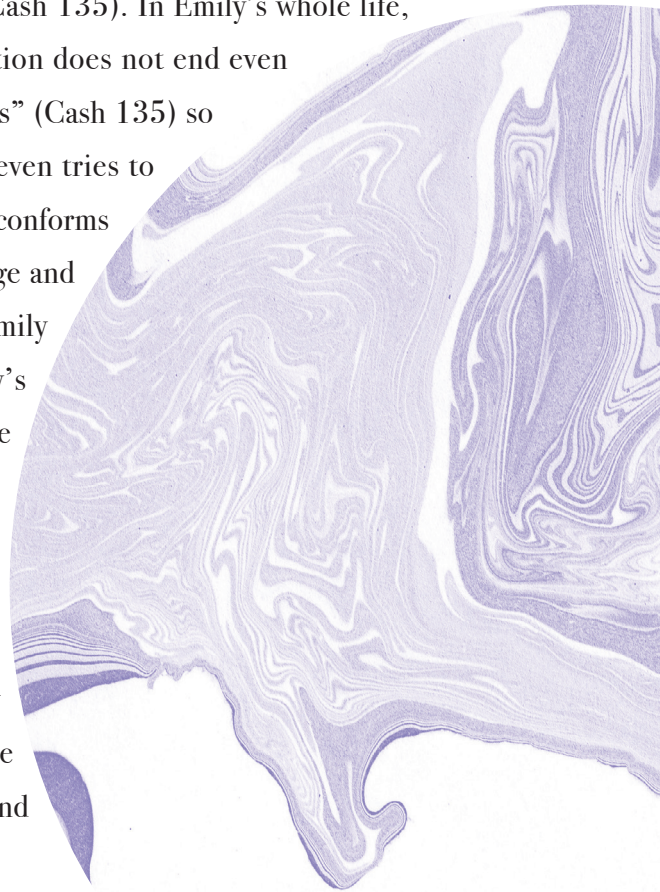
rules but also challenges their conventions, but what about Emily's necrophilia? Does her necrophilia stand for her obedience to Southerners or for her attack against Southern values? Dilworth thinks that Emily's idealization of the dead is as the same as Southerners' idealization of Emily. However,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f we examine Southerners' religion and the aristocratic values.

Emily's preservation of corpses needs to be considered in two parts because the preservation of her father differs from the preservation of her lover. Through preserving her father's body, Emily seems to follow Southern values. Cash claims that "the faith of the fathers" is also an essential value for Southerners and this faith supports their "patriotic pride" (Cash 135). In Emily's whole life, Emily's father strictly protects her, and her father's domination does not end even though he passes away. Emily clings to "the faith of the fathers" (Cash 135) so much that she refuses to accept the death of her father and even tries to preserve the corpse (Faulkner 492). We have seen that Emily conforms to Southern values through preserving the aristocratic heritage and living under chivalric obligations, but it is surprising that Emily adheres to Southern values in such an eccentric way. Emily's necrophilia toward her father shows how Southern values have distorted her mind.

Different from the preservation of her father, Emily's necrophilia toward Homer can be regarded as an expression of rebellion against Southerners. Earlier in this essay, I have discussed "the conflict of the Yankee" (Cash 62) and see how Southerners dislike Yankee. It is easy to understand that the townspeople would feel disgusted and shocked when they find that Emily has preserved Homer's body and idealized a Yankee.

Although Emily attempts to fight against Southern values, her rebellion seems to fail because Southerners still oppress Emily with their idealization even when she is dead. Southerners' idealization of Emily is based not only on "the myth of paradise" (Dilworth 253) but also on the belief in the Civil War. They idealize Emily as one of the Confederate soldiers as Faulkner depicts Emily's funeral in which Emily is buried among the graves of the Confederate soldiers, and Southerners think Emily "join[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ose august names" (Faulkner 489). For Southerners, the Civil War was considered as "a holy war," and soldiers dying in the battlefield would win "redemption" for their country and themselves (Berends 106). As Emily joins the rank of the Confederate soldiers, her death is idealized as the salvation of her and Southerners more generally.

In conclusion, Emily evidently conforms to Southern values: she preserves the heritage of the aristocracy and satisfies Southerners' fancy to chivalry. However, the way she follows the Southern





values also distorts her mind. Emily's preservation of her father's corpse based on her adherence to "the faith of fathers" (Cash 135) is actually eccentric. Even though Emily attempts to rebel against Southerners by challenging their superiority, Emily still suffers from Southern conventions. Her whole life and even death are confined to Southern religion and aristocratic values. From Emily's necrophilia, we find an obedient woman who follows Southern rules developing morbid idealization, and her rebellion ends in failure.

Works Cited

- Argiro, Thomas Robert. "Miss Emily after Dark." *Mississippi Quarterly: The Journal of Southern Cultures* 64.3-4 (2011): 445-65. Web. 15 Feb. 2016.
- Berends, Kurt O. "Confederate Sacrifice and the 'Redemption' of the South." *Religion in the American South: Protestants and Others in History and Culture*. Beth Barton Schweiger and Donald G. Mathews. Eds. Chapel Hill: The U of North Carolina P, 2004. 99-123. Print.
- Brooks, Cleanth, and Robert Penn Warren. "A Rose for Emily." *Understanding Fiction*.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59. Print.
- Cash, W. J. *The Mind of the South*.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1. Print.
- Dilworth, Thomas. "A Romance to Kill for: Homicidal Complicity in Faulkner's 'A Rose for Emily.'" *Studies in Short Fiction* 36.3 (1999): 251-62. Web. 15 Feb. 2016.
- William Faulkner. "A Rose for Emily." *The Faulkner Reader: Selection from the Works of William Faulkn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1. 489-97. Print.

2018 年 3、4 月外文所演講資訊

3/I4

Speaker: Karen Thornber, Professor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Victor and William Fung Director,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Chair,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Council

Topic: Global Environmental Crises and Asia

Time: 2:00 p.m. – 4:00 p.m., Wednesday, 14 March

Venue: 政大百年樓一樓會議廳

3/I5

Speaker: Anne Scott, Honorary Research Fellow, School of Humanities M208,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UWA), Perth, Australia

Topic: Introducing Robert Mannyng's Handlyng Synne

Time: 2:00 p.m. – 3:30 p.m., Thursday, 15 March

Venue: 外文系校史館會議室

3/I6

Workshop: 「東亞區域比較文學與文化的回顧與前瞻」 (East Asian Regional Studies: History and Prospect)

Speakers:

Karen Thornber, Harvard University

劉亮雅 Liou, Liang Ya, NTU DFL

李鴻瓊 Li, Hung-Chiung, NTU DFL

朱秋而, NTU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洪瑟君, NTU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黃美娥 Huang, Mei-E, NTU Taiwan Literature

鄭芳婷 Cheng, Fan-ting, NTU Taiwan Literature

Time: 2:00 p.m. – 5:00 p.m., Friday, 16 March

Venue: 台大文學院會議室

3/I9

Roundtable discussion: The Future(s) of Graduate Work: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Speakers:

Amy K.S. Chan, Associate Academic Vice-President (Teaching & Learning Development);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irector, M.A. Programme in Interdisciplinary Cultural Studies,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Kin Yuen Wong, Professor & Head, 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 Literature; Director of Graduate School,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劉亮雅 Liou, Liang Ya, NTU DFL

李鴻瓊 Li, Hung-Chiung, NTU DFL

Time: 10:00 a.m. to noon, Mon. 19 March

Venue: 外文系校史館會議室

4/I7

Speaker: Christie McDonald, Smith Professor of Frenc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of Romanc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Professor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arvard University

Topic: Rethinking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a Cultural History of Women Writers, 1715-1793

Time: 4:00 p.m. – 5:30 p.m., Tus. 17 April

Venue: 台大文學院會議室

4/I8

Speaker: Christie McDonald, Smith Professor of Frenc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of Romanc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Professor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arvard University

Topic: Encountering Thoughts: Thinking Through Interdisciplinarity

Time: 4:00 p.m. – 5:30 p.m., Wed. 18 April

Venue: 文學院演講廳

4/20

Speaker: Christie McDonald, Smith Professor of Frenc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of Romanc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Professor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arvard University

Topic: Workshop: Thinking Through Encounters

Time: 3:00 p.m. - 5:00 p.m., Fri. 20 April

Venue: 台大文學院會議室



Project+

GIFLL Newsletter

Subscribe here: <http://epaper.ntu.edu.tw/?p=subscribe&id=1>

點此訂閱！